

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前提

——以浙江苍南县为个案

刘小京

本文以浙江省苍南县为个案,从社会生态环境、生活世界、系统世界、社会发展与社会整合等方面,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前提给出了描述和分析。据此,我们可以窥知长时段历史过程支配和影响后期社会经济发展的若干方面。

作者:刘小京,男,195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组织室研究人员。

本研究的主要资料是1983年5月至1992年11月笔者先后7次对浙江温州地区的社会调研所得。考察框架是:(1)地方社会生态环境;(2)地方生活世界;(3)地方系统世界;(4)地方社会发展和整合的特性。在此,有必要简要解释一下研究中将涉及的几个基本概念。“长时段”是法国年鉴史学大师布罗代尔(*Braudel, Fernand*)提出的,指社会上现实与群众之间形成的一种有机的、严密的和相当固定的关系。布氏强调,长时段“因长期存在而成为世代相传、连绵不绝的恒在因素,它们妨碍着或左右着历史的前进”,并“表现为人类及其经验几乎不可超越的限制。”^①“生活世界”是现象学创始人、德国的胡塞尔(*Husserl, Edmund*)提出的,即“人类的现实”;它用以强调“人们生活在一个浸透他们精神生活中的熟视无睹的世界里,正是在这个世界中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它是由客体、人群、地域、思想以及他们所能看到和觉察到的所有东西组成的,而人们认为所有构成了他们的存在、他们的活动、他们的追求的参数。”^②“系统世界”则是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 Jürgen*)提出的,指“围绕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行政机构活动而展开”的世界。^③但在本项研究中,后两个概念略作一些调整:“生活世界”的内涵有所缩小,而“系统世界”的内涵稍有扩大,并将概念的关注点转向状态。

苍南县是1981年由平阳县析置的新县。它在行政上隶属于温州市,土地总面积1261平方公里,现有人口108万人。复杂的地理环境、人口构成及特殊的资源禀赋,使苍南地方社会生态环境显现出若干特质。

1. 地理环境

① [法]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载蔡少卿主编《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 参见[美]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第九章《朱尔根·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 同上书,第十四章《早期互动论与现象学》。

苍南县位于浙江省最南端,隶属温州市,而温州在明清即以“冲”、“难”著称,^①并有瓯江、飞云江、鳌江和南、北雁荡山等将全境分割得支离破碎。迄今,温州市尚不通铁路;几条主要河流上的公路桥及温州机场等,均为近十年所建;全部过境公路均重荷难负,拥挤不堪,且路况较差。

苍南县县城与温州市区之间,更有飞云江、鳌江两条大河分隔。苍南县东临大海,北界鳌江,西有南雁荡分支玉苍山,主峰大玉苍,距海岸线虽仅50公里,却已有海拔921.5米的高度;往南,与闽省交界处亦为绵亘不绝的山地。全县海岸线155公里,大小河流154条,山区占总面积的63%。县内主要小平原如南港平原、江南平原和马站——沿浦平原均被丘陵、河网、大海重重禁锢,几如匣中弹丸。全县被分裂为3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其中,江南的主体是濒海小平原,内部河网纵横,与南港有横阳支江相隔断,与蒲门有丘陵山地为屏障,蒲门也濒海,但以山地为主,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马站——沿浦平原极为细小,仅12平方公里。南港为内陆区,拥有玉苍山主峰大玉苍。迄今,县内部分大镇间的公路仍为石子路面,坑坑凹凹,行车相当艰难;尽管县城及若干大镇已装备直通各省的电话,但部分乡镇使用的电话机仍为手摇式,与外界联系殊为不便。^②

2. 人口构成

今纂《苍南县志·人口志(初稿)》称,“本县最先居民为何,已难查考,各姓人口,原来均先后从外地迁入。”“就时代言,早而可考者为唐末、五代,其次为宋末、明末,晚者为清康熙9年(1670年)以后。”乡间调查也表明,现有居民多为明清两代陆续从外地迁入者后裔。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积淀于今苍南境内,经长期繁衍生息及社会交往,形成了相互区隔的文化小传统。这些文化小传统间最显而易辨的差别是方言。民国修《平阳县志》称,“今以言语分别,约有五派。曰瓯语,曰闽语,曰土语(俗称蛮语),曰金乡语,曰畚民语。大别区之,县治及万全区纯粹瓯语,小南则闽语十一;江南则闽语、土语与瓯语参半;金乡语唯旧卫所而已;北港则闽语六,瓯语四;南港、蒲门则闽语七八,瓯语二三焉。”这其中,江南、旧卫所、南港、蒲门均在今苍南境内。该县志注称,“瓯语本为瓯族,闽语来自闽族”;“惟土语江南一区有之,其称瓯语为后生语,则似海滨土著本作是语,后盖化为瓯语也;金乡卫,前明指挥部属居焉,初自用其乡之语,后与土语相杂成金乡语;若畚语则散居南北港、蒲门各山岙,其语亦属少数。”也就是说,一县之中,竟有5种不同方言在发挥交际功能,人口构成之复杂由此可见一斑。

3. 资源秉赋

在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在明万历年间纂修的《温州府志》中,即已告称温州“土薄难艺”,“民以力胜”,“能握微资以自营殖。”乾隆《温州府志》又进一步称,“民勤于力以胜地”。^③可见,温州暨平苍一带受土地资源限制而推动的农业生产集约化由来已久。清嘉庆25年(1820年),温州府户均耕地5.9亩。但由此以降,人口增长率长期居高不下。1932年,温州市(含辖县)有234.1万人,1982年已增至526.0万人,增长了124.7%。平苍一带的人口增

① 《清史稿》卷六十五,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8册,第2146页。在这里,“冲”指地方冲要,“难”指民风强悍难治。

② 以上资料多据采访所得(以下凡藉此获得的资料,一般不再加注);并参考了《浙江地理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苍南县统计局《统计年鉴(1991)》。

③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总志》(上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页;张仁寿、李红:《温州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长率更高:康熙 60 年(1721 年),原平阳县有人口 248123 人,至宣统 3 年(1911 年)已增至 467960 人,1932 年再增至 657669 人;1980 年,原平阳县人口已达 1591617 人,比 1932 年增长了 142.0%。然而,耕地后备资源已罄,人口增长只意味人均耕地拥有量的减少;1944 年,原平阳县人均耕地(水田旱地合计)1.32 亩,至 1978 年已减至 0.62 亩。^①因此,平苍居民与土谋食显得异常艰难。

但由于苍南地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地带,纬度偏南,靠山面海,气候温暖湿润,适宜茶树等多种经济作物生长,且颇具渔盐之利;何况,蒲门地区的矾山,明矾总储藏量 1.57 亿吨,居全国首位;南港地区的碗窑,陶土资源也颇易开采。

二

特殊的社会生态环境,对于构造具体的地方生活世界,影响相当深远。下面,即着重描述苍南生活世界层面上对本项研究有着密切关联的几个方面。

1. 宗族组织

早在宋元时期,平苍一带的世家巨族即已有了较完备的宗族组织。^②晚清以降,一般乡民也有了宗族组织,他们各自供奉一个明确的始迁祖;定期祭祀、展墓、修谱。宗族集团内部互动频繁,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上,借助宗族组织之处所在多多;任何个人和家庭都难以置宗族利益于不顾。历史上形成的聚族而居一直延续下来。据统计,钱库区 10 个乡镇,5 个居委会,137 个行政村,213 个自然村中,就有 43 个以姓氏命名的行政村,占行政村总数的 31.38%;自然村以姓氏命名的或者有姓氏色彩的有 60 个,占 28.1%。全区有 1/3 的人口,即近 6 万人,分别居住在与之同姓氏命名的村落。^③“国情调查·苍南县情课题组”在江南地区的调查也表明,3 个乡镇 8 个行政村内,户主为首位姓和次首位姓的家庭合计,最低者也占全村家庭总数的 59%,高者则在全村范围内没有一个异姓户。^④

随着人口增长、迁徙和社会经济地位变动等等,一些大的宗族集团又往往分化为不同的支、房。一些支、房还自建供奉本支、本房祖先的支祠,修纂支谱;他们已具有相对独立性。

除此之外,还有联宗,即同姓之人认作同族。联宗使宗族组织规模向巨型化发展。由于吴语、闽语中黄、王不分,因此黄、王两姓也往往视为同姓。县人又多为不同历史时期闽中移民后裔,而闽中又有“八姓一家”的传说,林、黄、陈、郑等姓有时也相互引为同族;再上溯殷周时代,现有各姓多源于传说中的子姓封国和姬姓封国,今虽姓异,然追根溯源则为一,联宗和结“相好姓”的活动愈益膨胀。

由是,宗族组织已发展成为层次丰富、结构复杂的组织系统。

2. 非农产业

由于人多地少,农耕不敷家计所需,平苍一带兼业性生产向为农户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 胡焕庸、张善余编:《中国人口地理》(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36 页;《苍南县志·人口志(初稿)》。

② 指宋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以“敬宗收族”为宗旨的宗族组织,它与上古宗法制和六朝世族有明显区别。参见盛冬玲:《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和宗族制度》,载阴法鲁等:《中国古代文化史》(1),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③ 徐蓬勃:《苍南县宗族械斗犯罪探源》,打印稿,约写于 1991 年间。

④ 参见拙作:《现代宗族械斗问题研究》,载《农村经济与社会》1993 年第 5 期。

并由此形成极具地方特色的兼业模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农户兼营家庭棉纺织业,矾矿开采和茶叶生产。

① 家庭棉纺织业。隆庆《平阳县志·民事》载,平苍妇女“不事刺绣,惟勤纺绩,昼夜无间。虽高门巨室,始齿之女,垂白之姬皆然。”19世纪中叶,宜山镇生产的白色棉布,俗称“筒布”,畅销闽、赣部分山区。由于农户普遍兼业纺织,本地棉花渐不敷所需,以致从宁波、黄岩一带收购棉花运到本地加工。至本世纪30年代,木制老式织布机改革为新式织布机,带动了农户棉纺织业花色品种的革新。抗日战争前夕,抵制日货,提倡不穿“洋布”的运动,战争时期的工业品价格提高,均促使群众选择江南土布,宜山市上购销花纱布的店行倍增,家庭棉纺织业生产也颇为兴旺。一些农户由此致富。① 抗战胜利后,江南棉纺织品的销售范围扩大,布行与花纱店更多,客商往来频繁,市场繁荣,农户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又有新的提高。据1990年修《平阳商业志》载,本世纪上半期,江南宜山、钱库等区的农村中,60%以上的妇女从事土布业生产,每年运销浙、闽、赣三省的土布达10万匹。②

② 矾矿开采业。早在元代,蒲门矾山即已有近百户人家。一边开山种地,一边挖地表矿石煎炼明矾。明初时,炼矾业已初具规模。清乾隆年间,苏州、宁波商人相继投资矾山。接着,本地矾商崛起,并逐步排挤了外地矾商。③ 民国初年,矾山有矾厂10余家,矿工3000余人。④ 30年代由于受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20余座窑,停闭仅留5窑,工人失业者万余人,即“烧矾者千余人,开矾者三千余人,挑运及卖柴薪者六千余人”。⑤ 矾矿的主产品为明矾。它行销各地。最著名者为兴记矾厂的“大明珠”,曾“驰誉上海、香港市场30余年”;致使40年代中期起,矾山有八、九家矾厂,与兴记矾厂联合推销产品。参加联营各厂的优质大明珠都用兴记牌号出售。⑥

③ 茶叶生产。清代邻县士人赵治璜,在所作《拣茶歌》中,⑦ 记述了江南金乡镇妇女从事拣茶活动的情况。其序称:“平邑金镇茶贾收茶,必拣去枝梗,炒焙入篓。其地妇女于黎明装束,挈伴到客邸领茶,列坐代拣”。其诗称:领茶欲早竞争先,鬢影香衣拥入帘;不是弓鞋行步缓,定教日日得头签。⑧ 苍南茶业生产中的雇佣劳动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江南、蒲门沿海的制盐业,南港桥墩区的制陶业和烟草加工业等也都颇具规模。

3: 外出经商打工等活动

农事之余,苍南百姓或在闽浙边界地带做小本生意,或南下闽南,北上沪杭,求职、打工作

① 原籍宜山区凤江乡的杨孔济,在《老屋》一文中称:我的上辈很穷,抗日战争期间,宜山一带土布业大兴,我家终于盖起了5间平房,这房子始建于民国32年(1943年),据说当年的造价约800银元。载苍南县文联《南窗》,1992年第2期。

② 本段内容除注明者外,大部分取自陈承中等《宜山纺织业的发展》,该文载《苍南文史资料》第一辑。

③ 以上有关矾山的资料,多取自林维栋《矾矿史话》,载《苍南文史资料》第一辑。

④ 林壮志:《从东瓯明珠实业公司到兴记矾厂》,载《苍南文史资料》第三辑;中共浙南特委负责人1931年5月17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参见中共浙江省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等:《红十三军与浙南特委》,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

⑤ 陈镇波:《刘绍宽(厚庄日记)的丰富内容和史料价值》,载《苍南文史资料》第五辑。按,民国初年与30年代中期的数字相差较大,当有统计口径方面的因素。

⑥ 林壮志:《从东瓯明珠实业公司到兴记矾厂》。

⑦ 据杨奔《苍南风土诗抄(下)》,载《苍南文史资料》第3辑。

⑧ 原引者注称,“头签”是针对“来捡茶者凭先后次序发签领茶、交茶”而言。

生意,有的甚至漂洋过海。受此影响,苍南渐具开放性。

4. 群体社会结构

据中共闽浙边界临时省委在1937年10月的一份报告称,^①闽浙边界地区“可分为山地和平地居住两种。”“山地可以说没有地主”,“农民多属贫农和稍好一点的小农”;“平地有50~60%以上的贫农和小农。”另外,平阳县国民党当局1943年的有关统计也称,全县农户中,自耕农占50%,半自耕农占35%,佃户占11%,雇农占4%。土地改革时,凡雇工、租田、银租(放钱收谷)、高利贷等均算作剥削收入,且剥削收入超过家庭收入1/2的,就算地主。然而,即便如此,划定的地主户也仅占今苍南县域内总户数的2%,户均拥有耕地22.9亩;在山区,甚至有10亩地即被划为地主者。^②至20世纪前期,地主在地方社会结构中不占特别重要的位置。

与地主社会地位下降相对照,苍南工商业户在嘉庆后迅速崛起。如金乡镇殷氏,以“殷大同”烟烛业在福州首屈一指,极盛时年获利10万元,雇工300多人,所制蜡烛行销东南七省;陈氏经营酱油酿造,拥有同春牌酱园,雇佣30多人,并在温州、瑞安开了分店,其产品一直销到东南亚,极盛时亦可左右金乡市场。

工商业大户的崛起,改变了苍南社会原有的收入排序。1946年10月中共浙南特委颁行的党费征收标准,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问题的有益资料(表1)。据此,可将40年代中期包括苍南在内的浙南地区的各阶级阶层经济状况从低向高大致排序为:工人与贫农,中农,月薪水在3—5万元者,月薪水在5—10万元者,富农及其他土地剥削者,月薪水20—30万元者。

表1 各类人员的党费征收标准 单位:元

人员类别	每月党费数额	人员类别	每月党费数额
工人与贫农	50—100元	有薪水者中每月3—5万元	300—500元
中农	200—500元	5—10万元	1000—2000元
富农以上	1500—10000元	20—50万元	10000—15000元

资料来源:《浙南——南方革命的一个战略支点》,第177页。

三

相对于地方生活世界而言,地方系统世界的具体构造过程与宏观社会环境的联系比较密切,但地方社会生态环境和地方生活世界在地方系统世界的构造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1. 地方传统精英

在皇权社会,地方传统精英主要指乡居官宦和其他有功名的士人。他们处于民间社会与官僚政治的接口处,对于调和双方冲突有重要意义。然而,明清时期,平苍传统精英的资格大多较低。据平阳旧志《选举志》载,1500—1905年间,全县共出了4名进士和21名举人。前清知县何子祥称,平苍“文风逊浙西远甚。士子得一青衿,便为止境,养习商贾事,科岁试聊以备功令”。本

① 《中共闽浙边界临时省委关于闽浙人民拥护红军情形的报告》,载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等:《浙南——南方革命的一个战略支点》,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② 本段内容除注明者外,部分取自王连岳等:《农业生产关系》,1992年打印稿。

县士人毛锦涛也承认,县人“诵读者率皆志气卑小,甫游痒辄束书高阁,营什一利;不然亦自视满足,不复切磋,以底有成。”^① 据此,平苍在科举人文方面的表现可用“人文不盛”来概括之。

近代以来,县内学子在接受近代教育方面的表现较科举时代强得多。一些人还藉以在北洋政府和以后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中谋得相当高的职务。但是,他们的社会活动场所已移至大都市,其在家乡的影响力已远不如前人。

2. 官僚政治

温州府向被朝廷视为“民风犷悍,遂至目无法纪”的地区。^② 而平苍一带又尤以“难治”著称。也许正因为此,当时政府规定,准平阳知县“俸满保题,以升衔留任注册”。^③ 如前述何子祥,前后任平阳知县七年,最后“卒于任上”。但这一优惠政策收效甚微。据查,1760—1910年间,平阳共换了73个知县,许多人仅在任年余甚至数月就因为种种原因去职。在任4年以上的,仅12人。平阳县循吏无一人被收入《清史列传·循吏传》,而平阳的酷吏昏官却史不绝书。如乾隆以降,在平阳任上被法办的知县就有3人。晚清时,温州府县官员姑息、纵容金钱会民变,又曾与地方精英发生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④

民国时期,平阳吏治问题较前更加复杂化。1911—1949年间,县长(知事)换了26个。其中,任职最长的张韶舞,为平阳县历史上最有名的酷吏。

3. 共产党精英

1924年,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谢文锦(温州永嘉县人),创建了中共温州独立支部。而后,苍南籍的王国桢、张培农等,相继成为“温独支”的成员。1928年1月,中共平阳县委成立,领导地方的革命斗争,直至1949年5月平阳全境解放。在长达21年的艰苦岁月中,许多领导人和骨干分子相继牺牲,今苍南县内,在历次革命斗争中牺牲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就达1000多人;至今,县内享受定期定量补助的老党员、老游击队员和老交通员仍有1627人。^⑤

根据本项研究给定的考察框架,共产党精英出现并卓有成效地工作,意味着地方系统世界走向全面分裂。而在具体的分裂过程中,两个与本项研究有密切关联的方面尤值得注意。

首先是共产党精英的构成。与皇权政治的核心人物主要为外地人士组成相区别,平苍一带的共产党精英主要为本地人士。在《苍南英烈》和《苍南县人物志(初稿)》中,其收录24名中共先烈的传记,均为平阳县人。其中1人与平苍革命斗争联系较少。其他23个人中,未上过学的3人(2人为妇女),初小毕业的2人,初小肄业的2人,中学肄业的1人,中学毕业的7人,大专肄业的3人,大专毕业的5人。其文化构成颇高。其视野、心胸和抱负,也强于皇权时代的地方传统精英。

其次是共产党精英执行的政策。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实施。平南区是今南港地区的前身,1937—1949年间中共平阳县委在此设置了区委。有报告称,“平南区党组织历来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由于该项工作做得好,每当环境险恶时期,‘社会名流’就主动为我

① 何、毛语均见民国《平阳县志·风土志·士习》。

② 《高宗实录》卷1023,第12—13页;转引自《康雍乾时期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页。

③ 汪志伊:《敬陈吏治之事疏》,载《清经世文编》卷十六,《吏政·吏论下》。

④ 参见拙作:《现代宗族械斗问题研究》。

⑤ 本段内容部分参考了中共苍南县委党史办:《苍南革命斗争大事记(1919—1949)》,1991年印行本,潘善庚:《温州试验区》,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们保释了许多被抓党员和革命群众。”^①统一战线还使得中共地方组织和骨干分子在地方社会中的声望提高,影响力增强。例如,1938年,平阳县委“为了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决定共产党员通过合法选举,可在国民党的乡镇、学校里任职”;结果,3名共产党员被选为乡(镇)长,1名党员出任镇事务员兼警备队长,还有一批党员当上了当地小学校长。^②

四

基于上述地方生活世界与地方系统世界的特征,使地方社会的发展与整合具有了鲜明的地方特性。其中,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起支配作用的几个方面依次为:

1. 地方社会经济水准

在传统社会中,平苍一带的非农业活动已相当普遍化,并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开放性。史料表明,1947—1948年,平阳县在商业方面比较发达,有商店1100家;但工业方面却相当逊色,统计报表中,机器加工业为零,手工业企业也仅有纺织厂3家,共有工人306人,瓷器厂4家,共有工人205人,年产值1250元,薯条厂1家,有工人254人,年产值140元。^③地方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传统经济范畴。

2. 城——镇——乡结构体系

相对完整的城——镇——乡结构体系是地方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前提之一。然而,温州本是一个不甚发达且远离其他大中城市的孤城,平苍诸镇与温州市和旧县治昆阳在社会经济活动方面不存在必然的统属关系,诸镇往往直接同周边诸府州厅县的腹地互通往来;相当数量的社会交流甚至不通过温州,而直接与上海、宁波、福州等地发生;平苍诸镇间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虽存在差异,但均形成一定规模,成为周边农村的社会经济中心。由是,使原来就存在的苍南诸文化小传统愈加明哲化和深刻化,而且为苍南的社会分化和社会整合带来了诸多难以泯灭的特性。

3. 传统精英的社会态度

苍南传统精英往往持积极的入世态度。如旧时金乡镇巨绅殷氏,在由族尊、曾任浙江高等法院院长殷汝熊编纂的宗谱稿本中明确提出,“天下四民,自士而外,农之利不如工,工之利不如商”,并多次表达了对先人从事工商业活动的推崇。与此同时,一些开明士绅均能顺应时代潮流,做若干有益的事情。其中最著名者为叶适今先生。据《苍南县人物志(初稿)》,叶先生1880年生,灵溪镇人,本人为前清生员,后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归国后曾任省都督府秘书、省教育会副会长等职。1934年间,各地成立农会,实行二五减租,叶先生带头响应,他在“凤池、凤岙原有出租水田数十亩,他把这几十张契据都无偿交还原主。河口叶村年收数十担租谷,除运回自家口粮,其余都周济了当地贫户。”另据胡节孙等《中共平南区革命斗争历史概况》介绍,叶先生“1937—1949年春先后为我们保出很多被捕的党员和群众。”在开明士绅的影响和带动下,使一些中小士绅亦能作些于社会有益之事。

① 胡节孙等:《中共平南区革命斗争历史概况》,载叶贵友主编:《艰难的历程——中国共产党平阳县各区革命斗争史》,1991年印行本。

② 《苍南革命斗争大事记》,第53页。

③ 李建光等:《温州经济的发展:一种所有权理论的解释》,载《农村经济情况》1988年第6期。

由是,便形成了平苍地方系统世界的特殊个性:地方精英与保守的宏观系统世界间保持着一种相对独立的关系,而这种相对独立的关系对地方民间社会的取向颇具影响力。

4. 地方文化小传统

苍南向有南港、蒲门、江南之分。其在自然地理方面的差异已如前述。在居民构成方面,南港、蒲门以明清时期迁入的闽南移民之后裔为主体,江南的居民构成则相对更复杂些。江南和蒲门沿海地区,受清初“迁海令”影响,居民变迁剧烈。在产业构成方面,江南以水田为主,农户兼业多为家庭棉纺织业;蒲门山地较多,农户兼业项目最重要者为矾矿;南港山地比重也较大,农户兼业项目有陶瓷、制茶和烟草加工等。除此之外,江南和蒲门沿海地区的渔业生产和晒盐业亦为传统生产结构中的重要构成之一。生产上的差异,导致了饮食文化上的区隔:江南人主食大米,南港多食番薯丝,蒲门主食除番薯丝外,还杂以海杂鱼。以此为前提形成的相互区隔的文化小传统,在互动过程中,不断强化各自的势力范围。加之宗族组织活跃,人们在家庭范围内难以完成的活动,大多可以寻血缘线索谋求支援。由是,不同文化小传统间裂痕扩大。在这方面,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金乡语”的形成和沿用。金乡语以明代金乡卫军人及家庭的家乡语为母体,杂以平阳土语而成,其使用范围仅限于金乡镇。但竟能在与母语差异极大,社会交往比较频繁,且已经具有一定开放性的环境中使用了600年,迄今不衰。矾山籍作家黄传会在《中国一个县》中称,“金乡人还可以引为荣的是他们拥有自己的独特语言——金乡话”;它“发音柔和,娓娓动听。我嫉妒地发现,金乡人相互间在用金乡话进行交流时,常常流露出一种优越感。”^①

地方精英在强化文化小传统氛围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苍南故事卷》中,曾以《周仲祥巧对地名》为题,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清末民初,江南士绅较多,南北港一带士绅较少,而周仲祥(1877—1943年)是南北港士绅中的佼佼者。一次,江南士绅与之出联征对,结果,周获胜,并为南北港赢来“江南十八头大猫怕江西垟一头豹”的心理满足。^②

跨出文化小传统的边界,有时甚至连国内名流也束手无策,奈何不得并不起眼的小地头蛇。金乡籍人殷汝骊,曾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次长;兄殷汝熊,曾任浙江高等法院院长;弟殷汝耕,亦为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然而,当殷氏于1916—1917年牵头纠合一些知名度不亚于他本人的名流合股在矾山开办东瓯明珠实业公司时,仍出现了“当地矾厂主利用本地人排外思想,暗中鼓动,对东瓯明矾公司抬高工价和柴草的价格,致使公司的生产成本高于本地矾矿”的事情;后来,公司改组为“兴记矾厂”,靠“吸收当地头人参加,给予干股”(即由公司送给股份,不出资金),才得以“经营颇为顺利”。^③

与地方文化小传统显化相联系,平苍人民的文化内向性明显增强。这一现象的形成,当与吏治不良,地方民间社会与宏观系统世界的互动关系长期紧张有关。据对《苍南故事卷》中41篇涉苍南历史人物的传说故事的分析,在55个重要角色中,正面角色36个,其中平阳籍人33个,占92%。包括绅衿19个,平阳籍名宦3个,也就是说,地方传统精英(名宦也可算作地方传统精英的一部分)占平阳籍正面角色的61%;平民(含拳师、樵夫、厨师、戏剧演员)5个,抗倭

① 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80—81页。

② 大猫即老虎;江西垟即南北港地区,包括今平阳县的肖江镇及麻步区的部分乡村和苍南县灵溪区及藻溪区、桥墩区的部分地区。

③ 林社志:《从东瓯明珠实业公司到兴记矾厂》。

团首、民变领袖 6 个。正面角色中,外地人士仅 3 个,包括邻县名宦 2 个,平阳知县 1 个。负面角色 13 个,外地人士竟占了 7 个,占 54%;包括知县 4 个(其中平阳知县 3 个),其他官员 2 个,外地平民 1 个。而且,涉及本地绅衿的,多有反抗官府暴政的内容,涉及本地名宦的,也含政治黑暗,清官反遭诬陷的内容。再查已出版的 8 辑《苍南文史资料》,涉及本地人士的篇什中,除一二篇涉及汉奸殷汝耕的史料外,其余均为对本地正面人物的记述。

中华民族在经历了太多的屈辱与不幸以后,终于走上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快行道。当此之际,潜心玩味一个颇具典型意义的中国地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确实使我们受益匪浅。任何个人和社会集团都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在这个古老的、传统丰厚的国度里,地方社会前期发展过程中加入的任何重要变量,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其后期发展过程的或然性和复杂性。可惜,我们迄今对此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尚不很充分。这已经并将继续要在相当程度上限制近期许多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的可操作性。但碍于篇幅,只能另文赘述了。

主要参考文献:

1.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 年版。
2. [美]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
3. [英]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
4. [法]布罗代尔:《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1—3 卷),三联书店 1992 年版。
5.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6. [美]费正清:《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7. [美]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 年第 1 期。
8. 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上下册),中华书局 1992 年版。

责任编辑:张宛丽